

厦门大学

国际法译丛

国际法院与法庭的

尤瓦·沙尼 著
韩秀丽 译



法律出版社
LAW PRESS · CHINA

厦门大学

国际法译丛

国际法院与法庭的 竞合管辖权

尤瓦·沙尼 著
韩秀丽 译



法律出版社
LAW PRESS ·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际法院与法庭的竞合管辖权 / (以)沙尼
(Shany, Y.) 著; 韩秀丽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1. 5

(厦门大学国际法翻译系列)

书名原文: The Competing Jurisdictions of
International Courts and Tribunals
ISBN 978 - 7 - 5118 - 2155 - 3

I. ①国… II. ①沙…②韩… III. ①国际法院—管
辖权—研究 IV. ①D813. 4②D993. 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92660 号

国际法院与法庭的竞合管辖权	(以) 尤瓦·沙尼 著 韩秀丽 译	责任编辑 卫蓓蓓 贾 菲
		装帧设计 乔智炜

© 法律出版社·中国

开本 A5

印张 11.75 字数 287 千

版本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出版 法律出版社

编辑统筹 学术·对外出版分社

总发行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永恒印刷有限公司

责任印制 吕亚莉

法律出版社/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100073)

电子邮件/info@lawpress.com.cn

销售热线/010-63939792/9779

网址/www.lawpress.com.cn

咨询电话/010-63939796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100073)

全国各地中法图分、子公司电话:

第一法律书店/010-63939781/9782

西安分公司/029-85388843

重庆公司/023-65382816/2908

上海公司/021-62071010/1636

北京分公司/010-62534456

深圳公司/0755-83072995

书号: ISBN 978 - 7 - 5118 - 2155 - 3

定价: 38.00 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负责退换)

总 序

在厦门大学国际法学科和法律出版社的共同努力和通力合作下,“厦门大学国际法译丛”问世了。这是厦门大学国际法学科发展史上值得祝贺和鼓励的学术盛事。

近年来,厦门大学国际法学科重视开展教师和学生两个层面的国际学术交流,创建厦门国际法高等研究院并连年举办“国际法前沿问题研修班”,连续参加“Willem C. Vis 国际商事模拟仲裁辩论赛”(维也纳)和“Jes-sup 国际法模拟法庭辩论赛”(华盛顿 DC),持续在国际性专业刊物和出版社发表学术论著等,均反映了本学科师生走向国际的初步努力。翻译国际法名著,则是更为基础性的国际化努力。

众所周知,我国国际法学的发展亟须汲取世界各国国际法学的精华。与国内法学者比较而言,国际法学者更迫切需要了解和学习国际同行的名著,更迫切需要与国际同行对话和交流。国际法名著的翻译成果,为我国法学院校广大师生和相关实务工作者提供了与国际法学术大师更为便捷交流的中文语境,功德无量。

当下十分提倡和强调学术创新。学术创新自有其发展规律,需要经历对既有优秀学术成果的吸收、消化、扬弃、升华的过程。国际法名著的翻译工作,对译者而言,是超越时空向国际法学术大师的虚心求教,是优

秀学术成果的吸收、消化的过程,也是创新的酝酿或前奏。进而言之,翻译工作是对原作融会贯通之后的再创作。在这个意义上,翻译工作也是创新。虽然,在现行各种学术成果评估体系中,译作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令人感佩的是,本译丛的译者能有“上善若水”的感悟与追求。

翻译的“信、达、雅”是学界一向追求和普遍认同的理想境界。对译者而言,“雅”是取决于已有文化积淀和文字功底的高标准,一时可能难以企及;而“信”、“达”则是不遗余力、必须达到的基本标准。国际法名著最理想的译者自然是学贯中西、潜心治学的年长国际法学者。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殊难如愿。值得庆幸的是,在本译丛第一批译者中,蔡从燕教授、陈辉萍教授、池漫郊副教授、韩秀丽副教授和龚宇博士等都曾在国际性专业刊物或出版社发表学术论著,或有翻译法学论著的经验。其他译者是莘莘学子中的佼佼者,后生可畏。2006年,厦门大学法学院代表队在美举行的“第46届 Jessup 国际法模拟法庭辩论赛”荣获“最佳书状奖第一名”(The Haldy C. Dillard Award),展现了我国新一代国际法学者的专业研究能力和英语运用能力,给国人莫大的自信与启迪。该最佳书状作者之一季烨博士生也忝列为本译丛译者。

“人之云,非知之难,行之惟难;非行之难,终之斯难。”本译丛作为厦门大学国际法学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持之以恒,当为我国国际法学的发展和繁荣作出应有的一份贡献。本译丛的生命力在于质量,希望得到国际法学界的持续关注和指导,更希望广大读者对译作多提批评意见,以利修订完善。

曾华群 谨识

2009年3月9日

目 录

绪论 /1

- 一、转型时期的国际法：国际法院与法庭的扩散 /1
- 二、方法论 /14
- 三、研究范围 /15
- 四、中心问题 /20

第一编 国际法院与法庭的管辖权重叠

第一章 什么构成竞合程序 /25

第一节 传统管辖权规制规则 /26

第二节 适用传统规则的条件 /28

第二章 管辖权重叠的划分：理论与实践 /36

第一节 具有普遍属人管辖权和普遍属物管辖权的不同法院与法庭间的冲突 /37

第二节 具有一般属人管辖权与属物管辖权的法院与法庭
和具有专门管辖权的普遍性法院与法庭的冲突 /40

一、对国家的属人管辖权范围之不同 /42

二、个人法律上的起诉资格之不同 /43

三、国际组织法律上的起诉资格之不同 /47

四、相关的程序 /49

五、涉及仲裁庭的竞合 /51

第三节 具有普遍的属人管辖权与属物管辖权的法院与法庭
和具有无限属物管辖权的区域性法院与法庭之间的冲突 /54

第四节 具有普遍属人管辖权和属物管辖权的法院与法庭和
具有专门管辖权的区域性法院与法庭间的冲突 /56

第五节 具有专门管辖权的不同普遍性法院与法庭之间的
冲突 /60

第六节 具有无限属物管辖权的区域性法院与法庭和具有
专门管辖权的法院与法庭间的管辖权冲突 /67

第七节 具有专门管辖权的普遍性和区域性法院与法庭之
间的冲突 /68

一、与贸易有关的管辖权冲突 /69

二、人权机构之间的管辖权冲突 /78

三、其他领域的重叠管辖权 /87

第八节 具有专门管辖权的不同区域法庭之管辖权冲突 /89

第九节 多方面的争端 /94

本章小结 /96

第二编 国际法院与法庭管辖权竞合的法律和政策问题

第三章 鉴于国际法院与法庭系统性的管辖权竞合 /101

第一节	国际法院和法庭扩散的管辖权含义 /101
第二节	竞合争端解决机构的结构关系对选择规制管辖权制度的影响 /106
第三节	存在国际法院与法庭体系吗? /109
一、	作为一个法律体系的国际法 /112
二、	存在国际法院与法庭体系吗? /134
第四节	国际法应当鼓励规制管辖权竞合吗? /150
一、	体系协调的重要性 /151
二、	作为增强体系协调性方法的规制管辖权规则 /154
三、	一个可供选择的办法:作为法律发展催化剂的矛盾 /156
	本章小结 /161
第四章	调整涉及国内法院竞合的管辖权规制规范:应当将它引入国际法吗? /164
第一节	与挑选法院有关的管辖权规制问题 /166
一、	单边挑选法院 /166
二、	关于引入国际反挑选法院规则的评论 /183
三、	挑选法院协议 /190
四、	关于国际法给予挑选法院协议效力的评论 /196
第二节	对与多重程序有关的管辖权问题的规制 /197
一、	平行程序 /199
二、	关于引入规制平行程序的国际规则的评论 /206
三、	程序的终局性 /209
四、	对国际法中终局性的评论 /217
	本章小结 /221

第三编 调整国际法院与法庭管辖权竞合的法律：实然法与应然法

第五章 调整国际法院与法庭管辖权的法律文件中之规制竞合规范 /227

第一节 挑选法院条款 /228

- 一、专属管辖权条款 /228
- 二、非专属管辖权条款 /247
- 三、妥协方法：有限的挑选法院 /263
- 四、默示的管辖权划分 /267

第二节 多重程序 /269

- 一、岔路口 /270
- 二、异地未决诉讼抗辩 /276
- 三、终局性原则 /283

本章小结 /287

第六章 国际法院与法庭适用的源自条约之外的规制管辖权规范 /291

第一节 传统规制管辖权规则的适用 /292

- 一、挑选法院原则 /292
- 二、平行程序 /304
- 三、既判力 /311

第二节 其他关于管辖权竞合的潜在规则和原则 /325

- 一、滥用权利理论 /325
- 二、礼让 /332
- 三、相冲突的条约义务 /340

本章小结 /343

第七章 未来改进的可能性 /346

第一节 结构改革 /346

- 一、管辖权重组 /347

二、联合国国际法院咨询管辖权的扩张 /350	
三、创立新的法院与法庭之可取性 /354	
第二节 增强司法合作 /354	
一、行使礼让 /355	
二、信息交换 /357	
第三节 就国家而言更好的战略规划 /358	
本章小结 /359	
结论 /360	

绪 论

一、转型时期的国际法：国际法院与法庭的扩散

每种国内法律制度都要满足两种基本需求,它们是维持社会秩序不可或缺的,即规范人的行为及和平解决争端。^{〔1〕} 在现代社会,第一种功能主要通过创设法律的机构来实现,而第二个目标通常通过争端解决机制,如法院和其他司法或准司法程序实现。在国际领域同样存在类似的社会需要。^{〔2〕} 促进国际社会福利所需要的、国际行为体[国家、国际组织(政府间国际组织)及某种程度上的自然人和法人]^{〔3〕}间改善的协调与合作,只能通过加强规制这些行为体的行为才能实现。^{〔4〕} 而且,由于国际行为体间将继续发生争端(考虑

〔1〕 Joseph Raz, *The Concept of a legal System* (2nd ed., 1980) (1990 reprint) 229; Harry C. Bredemeier, *Law as an Integrative Mechanism*, in *law and Sociology* (W. M. Evan, ed., 1962) 73, 74.

〔2〕 Malcolm N. Shaw, *International Law* (4th ed., 1997) 717; Philip Allot, *The Concept of International Law*, 10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999) 31; Jonh A. Perkins, *The Changing Foundations of International law: From state consent to state responsibility*, 15 *Boston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1997) 433, 506.

〔3〕 Shaw, *supra* note 2, at 191 - 5.

〔4〕 Prosper Weil, *Towards Relative Normativity in International law?*, 77 *AJIL* (1983) 413, 418 - 9.

到它们经常发生利益和需求冲突),^[5]所以应该准备好和平的争端解决方法以防止国际社会所赖以存在的法律安排崩溃。

20 世纪,通过条约、国家实践及软法立法进行的国际造法活动剧增。^[6]总的看来,国际法也延伸到以前没有规范的国际关系领域(例如,人权和保护环境)。^[7]现今,这种广泛的规范为国际行为体如何行为提供了合理(尽管不完美)的指引。然而,国际法在防止和解决涉及上述规范的解释和适用的国际争端方面远不能令人满意。试图鼓励各国和其他国际行为体诉诸有效的国际争端解决机制,诸如联合国国际法院(ICJ),面临着几乎不可逾越的障碍:主权国家的观念及与之相伴的要求将国家同意作为设置大多数国际义务,包括程序义务的前提。^[8]由于不能强迫国家违背其意志参加裁决的观念已广为接受,并且国家不愿意通过使自己事前(*a priori*)服从国际法院或法庭的管辖权从而限制其诉讼自由(*freedom of action*),^[9]

[5] J. G. Merrills,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 (3rd ed., 1998) 1.

[6] 软法由调整行为的规范组成,这些规范没有法律约束力,基本上是通过国际组织通过的没有约束力的决议和标准创设。Paul Szasz, *General law-Making Process*, 1 *United Nations legal Order* (Oscar Schachter and Christopher C. Joyner, eds., 1995) 35, 45-7.

[7] Pierre-Marie Dupuy, *The Danger of the Fragmentation or Unific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System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31 *NYU J Int. L & Pol.* (1999) 791, 795.

[8] *The Locus (France v. Turkey)* 1927 PCIJ (Ser. A) No. 10, at 18.

[9] Lois Henkin, *How Nations Behave* (1979) 187. See also Stephen M. Schwebel, *Reflections on the Rol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Justice in international law* (1994) 3, 10; Jeffrey L. Dunoff, *Institutional Misfits: The GATT, the ICJ and trade-environment disputes*, 15 *Mich. J Int'l L* (1994) 1043, 1089-90; J. Patrick Kelly,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Crisis and reformation*, 12 *Yale J Int'l L* (1987) 342, 365. At the same time, disputes perceived as unimportant might also not be submitted to adjudication. Richard Baxter, *Introduction to Symposium on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11 *Va. J Int'l L* (1971) 291, 291-4.

国际争端解决中还没有出现与国内法律制度相同的全面的强制制度。^[10]

尽管如此,这种结构上的不足并不意味着国际法完全不能发展国际争端解决机制。恰恰相反,争端解决的外交方法(如磋商)始终是国际关系的组成部分。而且,自18世纪晚期以来,许多国家就愿意在某些情况下将特定争端,甚至各类争端提交裁决。然而,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根本不愿意承诺将所有争端提交有约束力的裁决程序的情形依然未变。^[11]国家的对服从有约束力的国际机构管辖权所表现出的排斥也阻碍了全面有效地执行争端解决机构裁决之执行程序的发展。缺乏受害方可以维护其权利的有管辖权的法庭,国际法院与法庭的判决也极少得到自动执行,它们的共同后果已经使国际法规范的有效性受到质疑。因此,一些评论家甚至曾质疑国际法是否是法律。^[12]

然而,随着近几十年来国际间相互依赖的增强,国际法上的争端解决机构经历了令人瞩目的变化(在20世纪90年代显著加快)。传统上由成员国所表现出来的不愿意事先使自己对司法或准司法争端解决机制承担义务的情况逐渐减弱,越来越多的国际法院与法庭被授予强制管辖权。这一趋势与争端解决机制制度化,即从临时

[10] 虽然《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3款和第33条文本表明成员国有参加争端解决的责任,但其确切范围是完全不清楚的。尽管《联合国宪章》明确禁止通过和平手段以外的任何手段解决争端,但是,完全可以质疑它是否提出了解决争端的相应义务(参加争端解决的积极义务)。Shaw, *supra* note 2, at 718.

[11] 仅仅约三分之一的联合国成员国通过任择条款接受了联合国国际法院强制管辖权的事实最恰当地证明了这种不情愿。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Art. 36(2), 26 June 1945, Annex to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XV UNCIO DOC. 355. 而且,已经接受法院强制管辖权的成员国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国家没有为了自己的利益提出限制接受强制管辖权的保留。

[12] Robert Y. Jennings and Arthur Watts (eds.) *Oppenheim's international law* (9th ed., 1992) 8-13. See also *infra* Chapter 3.

特设争端解决程序到新的常设程序,取得的巨大进步相一致。因而,现今许多国家(和其他国际行为体)同意将涉及众多重要国际法领域的争端提交裁决,并为此目的接受常设的国际法院与法庭的强制管辖权。

这些令人瞩目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作如下解释:(1)国际规范的密集度、数量及复杂性不断增加,这需要有相应复杂的争端解决机构以保证新的法律安排得以顺利运行及其法律规范得到不断的澄清和发展;^[13](2)在国际关系方面,忽视权力导向的外交,更大程度地承诺遵

[13] Georges Abi-Saab, *Cours Général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207 *Recueil des Cours* (1987) 9, 93; Georges Abi-Saab, *Fragmentation or Unification: Some concluding remarks*, 31 *NYU J Int. L. & Pol.* (1999) 919, 925; Cesare P. R. Romano, *The Proliferation of international judicial Bodies: The pieces of the puzzle*, 31 *NYU J Int. L. & Pol.* (1999) 709, 728-9.

可以在世界贸易组织(WTO)、《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及《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中发现,在新的复杂的法律机制中并入了新的争端解决程序。See e. g. Alan E. Boyle, *Settlement of Disputes Relating to the law of the Sea and the 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 Justice* (Kalliopi Koufa, ed., 1997) 295, 305; Robert y. Jennings, *A New Look at the Place of the Adjudica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oday*, 1 *Collected Writings* (1998) 450, 460; John H. Jackson, *Fragmentation or Unification among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31 *NYU J Int. L. & Pol.* (1999) 823, 827.

人们也可能注意到,规范更大特殊性及随之改进的法律确定性已使各国对裁决的理念更加满意。Jennings, *Adjudication in Int'l Relations*, *supra*, at 462; Robert Y. Jennings, *The Discipline of International Law*, 1 *Collected Writings* (1998) 314, 325; Robert Y. Jennings, *The Progress of International law*, 1 *Collected Writings* (1998) 271, 285; Tullio Treves, *Recent Trends in the Settlement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s*, 1 *Bancaja Euromediterranean Courses of International Law* (1997) 395, 401.

最后,诉讼易于使大的国际行为体与小的国际行为体“平等竞争”(level the playing field),因此吸引了小的国际行为体参加那些提供强制裁决的体制。See e. g. *Third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he Law of the Sea*, 4th Sess., 58th mtg., V *Third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he Law of the Sea: Official Records* (United Nations, 1976) 10, 11, 25-6, 33, 41, 48, 50. But see *UNCLOS: Off. Rec. id.*, at 34, 45.

守国际关系中的法律规则；^[14] (3) 过去阻碍裁决程序发展的国际紧张关系得到缓解；^[15] (4) 一些国际法院与法庭（例如，欧共体法院和欧洲人权法院）的积极经验有助于设立类似机构；^[16] (5) 联合国国际法院及其他既有法院与法庭不适合处理许多类型的争端，^[17] 尤其

[14] 外交思想和法治思想渐渐从国内政治向国际政治扩散。因此，国内法中促进良治和遵从司法判决(judicial decision)的习惯指导着参与国际交往的政治家和公职人员。Shaw, *supra* note 2, at 11; Laurence R. Helfer and Anne-Marie Slaughter, Toward a Theory of Effective Supranational Adjudication, 107 *Yale LJ* (1997) 273, 332. 有趣的是，我们注意到康德(Kant)已经看到民主价值与国际稳定的关联(linkage)。Immanuel Kant, *Eternal Peace*, in *The Philosophy of Kant* (Carl J. Friedrich, ed., 1993) (1795) 475, 484[在其他出版物中，同一文章的标题是“永久和平”(Perpetual Peace)]。

同时，有许多支持国际争端去政治化的效率考量。Jonathan Charney, The Impact on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System of the Growth of International Courts and Tribunals, 31 *NYU J Int. L & Pol.* (1999) 697, 703 - 4; Ernst-Ulrich Petersmann, Constitu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Adjudication: How to constitutionalize the U. N.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 31 *NYU J Int. L & Pol.* (1999) 753, 783; Jackson, *supra* note 13, at 827.

[15] Bruce Broomhall, Looking Forwards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Between State consent and the rule of law, 8 *Crim. L F* (1997) 317, 318; Romano, *supra* note 13, at 729 - 33. 社会主义和发展中国家从中央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也有助于扩展共同的国际基础，这种国际基础使新的复杂的法律体制得以发展。

[16] John W. Bridge, The 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and the Prospects for International Adjudication, *International Courts for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Mark W. Janis, ed., 1992) 87, 91; Romano, *supra* note 13, at 730.

[17] 例如，联合国国际法院不能裁决以非国家为当事方的争端。因此，在此类行为起重要作用的法律领域内很难利用它解决争端（例如，贸易、人权、投资）。Jonathan Charney, Third Party Dispute Settlement and International law, 36 *Colum. J Transnat. L* (1997) 65, 76. 另外，大量批评指向国际法院程序的不充分和一些国家所感觉到的政治偏见。Abi-Saab (1987), *Supra* note 13, at 255 - 7; Gilbert Guillaume,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Judicial Institutions, 44 *ICLQ* (1995) 848, 851, 854; Shigeru Oda, Dispute Settlement Prospects in the Law of the Sea 44 *ICLQ* (1995) 863, 865; Petersmann, *supra* note 14, at 774; Jonathan I. Charney, Is International Law Threatened by Multiple International Tribunals?, 271 *Recueil des Cours* (1998) 101, 133.

是那些需要非常专业化^[18]处理的复杂问题或被认为最好是在区域水平上处理的争端。^[19]

藉此,作者认为,更大程度地接受国际法院与法庭的强制性管辖及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制度化,最近这两种发展趋势的综合效果使国际法的有效性发展到新的、改善的水平。在许多案件中,反对方仅仅通过保留其同意或在可利用的程序方面拒绝合作来阻挠司法机构解决争端已不再可能。相反,在强制性裁决管辖权出现的法律领域,法律义务能够由其他当事方(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通过单边启动现行司法机构,采用国内法律环境下相似的方式对各国实施。这是重要的质变,这种质变明显促使国家更严肃地承担他们的国际义务。尽管这些成绩令人赞叹,国际法渐进的发展过程仍远未结束。这主要是因为对不服从判决的诉讼当事人(尤其是国家)的实际执行仍然是令人头痛的问题。

在1920年《常设国际法院规约》(PCIJ)引入的“任择条款”中,首次发现前述两种趋势的融合,^[20]并且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出现了特别令人赞叹的发展势头。近年来国际司法机构数量急剧增加(有时被称为“国际法院与法庭的扩散”),并且,几乎所有新的司法机构在一定程度上都有强制管辖权的属性。

[18] Charney(1998), *supra* note 17, at 351; Charney(1997), *supra* note 17, at 76; Rosalyn Higgins, *International law in a Changing System*, 58 *Cambridge LJ* (1999) 78, 86-7; Brigitte Stern, *Concluding Remarks*, 9 *ASIL Bulletin* (1995) 49, 51.

[19] Bridge, *supra* note 16, at 91; Charney(1997), *supra* note 17, at 76; Robert Y. Jennings, *The Proliferation of Adjudicatory Bodies: Dangers and possible answers*, 9 *ASIL Bulletin* (1995) 2, 3; W. Michael Reisman, *Creating, Adapting and Designing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s for the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9 *ASIL Bulletin* (1995) 8, 10.

[20] Statute of the Permanent Court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 16 Dec. 1920, Art. 36, 6 LNTS 390. 根据本条,国家可能宣布根据事实(*ipso facto*),对其他作出类似声明的国家,接受常设国际法院的强制管辖权。

事实上,在过去10年,有6个新的常设法院开始运转。这些法院是国际海洋法庭(ITLOS)、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上诉机构(WTO AB)、欧洲自由贸易区法院(EFTA Court)、中美洲法院(CCJ)、独联体法院(CIS Court)及东南非共同市场法院(COMESA Court)。这是令人瞩目的发展,因为20世纪90年代之前只有6个左右国际法院实际在工作,即联合国国际法院(ICJ)、欧共体法院(ECJ)、安第斯共同体法院(Andean Community Court)、比荷卢共同体法院(Benelux Community Court)、欧洲人权法院(ECHR)及美洲国家间人权法院(I/A CHR)。

而且,所有新法院对于其基本法律文件(constitutive instrument)的缔约方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强制管辖权:国际海洋法庭在一些范围较窄的事项上对《1982年海洋法公约》的138个缔约方有强制管辖权;^[21]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在广泛的事项上被授予对144个成员方的强制管辖权;除了一个区域法院外,所有区域法院被授予对参加区域条约机制的所有国家以广泛的强制管辖权。^[22]

不但已经有7个法院开始运转,而且几个其他国际法院目前也在设立过程中。因此,国际刑事法院(ICC)、西非经济共同体法院(ECOWAS Court)、加勒比法院(Caricom Court)、南锥体共同市场(MERCOSUR)常设审查法院、非洲人权及民族权利法院(African Court on Human and People's Rights)在近期可以开始运转(就国际刑事法院来说,有望在未来几个月内受理案件)。所有这些机构也有望对其基本法律文件的缔约方行使广泛的强制管辖权。

近年来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发展是设立了新的被授予广泛属物管

[21]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10 Dec. 1982, Arts. 187, 287, 290, 292, UN Doc A/CONF 62/122 (1982), 21 ILM (1982) 1261.

[22] 唯一的一个例外是中美洲一体化机制(SICA), 6个成员国中只有3个成员国接受中美洲法院(CCJ)的强制管辖权。